

【精神文化】

从五四到新时代：革命文化的历史性跨越

——基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五四运动及革命文化相关论述的分析

胡献忠

【摘要】中国革命文化体现的是中国共产党的世界观、政治观、价值观，贯穿其中的主线是打破旧文明，创造新文明，变革经济社会、世道人心，建构现代国家、现代社会，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它起源于五四反帝反封建精神，在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斗争中逐渐成熟定型。新中国成立之初的革命文化是以往反帝反封建内容的延续，艰苦创业随后成为革命文化的重要内容。改革开放纠正了曾经的探索偏差，强调五四精神回归以及在市场经济改革中的价值和意义。进入21世纪，科学发展拓宽革命文化的边界，五四精神与民族复兴的有机衔接得到进一步强化。新时代党以自我革命推动伟大社会革命，提升了革命文化的新境界，五四精神在新时代青年群体中不断扩大认同与传播。

【关键词】五四精神；革命文化；政治认同；新时代

【作者简介】胡献忠，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青运史学科首席专家，研究员。

【原文出处】《中国青年研究》（京），2020.7.38~46

【基金项目】本研究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大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研究”（项目批准号：2019MZD017）阶段性成果。

中华民族历经沧桑却生生不息，苦难深重却绵延不绝，重要原因之一在于这一民族拥有适应性变革的强大内核。每一次对内外挑战的回应、对上下危机的应对，最终都会沉淀为一种理性精神，从而为民族走出困境积累着丰富的智慧和经验。晚清以降，中华民族遭遇有史以来的最大危机，不得不在世界工业化的旋涡中重新思考生存方式和获取途径，五四运动就是中华民族重获新生、走向现代的重要拐点。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五四运动以全民族的力量高举起爱国主义的伟大旗帜，以全民族的行动激发了追求真理、追求进步的伟大觉醒，以全民族的搏击培育了永久奋斗的伟大传统。在各种政治力量的角逐竞争中，最终有能力把中国引向现代化道路的是中国共产党。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在意识深层

秉持五四理念，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在近百年的奋斗历程中，为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形成了独特的革命文化形态，成为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

一、五四精神与中国革命文化生成的历史逻辑

《辞海》对于“革命”的释义有二：其一，古代以为王者受命于天，故称王者易姓，改朝换代为“革命”；其二，指人们在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中所进行的重大变革。不论从哪个角度讲，在中华民族深厚的历史基因中，革命、变革所占的分量都很重。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中国共产党以开天辟地的勇气和革故鼎新的执着，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对政治心理、政治理想、政治观念、政治伦理、政治策

略、政治制度、政治道路等进行一系列文化价值建构,形成了特定的革命文化。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我们是革命者,不要丧失了革命精神”^[1]。讲的就是革命精神、革命文化对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所具有的主导性价值和意义。

1. 五四运动为中国共产党阐述政治革命提供了理论源头

陈独秀在1915年发起新文化启蒙运动,锋芒直指旧道德、旧文学和文言文。陈独秀无情指摘儒家三纲五常的封建礼教造成了独立人格的丧失,由此而生的忠、孝、节等是奴隶道德,是妨碍中国民众觉醒的大敌。李大钊则把对孔教的批判上升到政治层面,他认为“孔子者,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也”。针对当时有人提出把孔教载入宪法的主张,李大钊一针见血地称之为“此专制复活之先声也”。鲁迅在《狂人日记》中更是把几千年的封建文化概括为“吃人”两个字。这种勇猛的姿态使新文化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尤其是在青年学生群体中产生极大震撼。各地宣传新思潮、批判旧文化的进步社团犹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这场包含民主、科学、自由、人权、理性等内容思想大潮,在中国开启了空前的思想启蒙运动。

巴黎和会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到中国后,已饱受新文化熏染的青年学生在民族尊严受到欺凌、民族利益遭到掠夺之际,以果断的行动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一是反帝,二是反封建。这两个基本点为日后形成的中国革命文化的最初底色埋下了伏笔。当时,全国范围内形成的反帝爱国热潮又与思想启蒙大潮相互激荡,在全社会倡导科学与民主思想,促进个人独立、自主人格的形成,并最终带来政治的民主化,促进社会进步,实现真正的社会革命。

众所周知,五四运动的深入发展直接推动新型现代政党——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五四新文化因而成为革命意识形态即革命文化的直接源头。两者之所以有如此密切联系,不仅仅在于中共早期组织的创建人大多是五四运动的激进分子和受五四思潮影响的先进分子(即“准备了干部”),也取决于五四运动

推动了马克思主义这一现代思想的传播(即“准备了思想”),而且,五四运动预演了中国知识分子与工人运动的结合并能生成巨大力量。中国共产党是在救亡图存的历史场景中诞生的,这一场景也正是五四运动场景的延伸。

1920年4月,正在上海筹备建立共产党早期组织的陈独秀,到中国公学发表激情演说,阐明五四运动所特有的两大精神,即“直接行动”与“牺牲精神”,他倡议青年学生“努力发挥这两种精神”^[2]。这一论断构成了中国革命文化的重要内容。事实上,自1921年下半年至1922年2月,全国范围内的罢工运动多达百余次,直接参与者30多万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或影响下,富有“牺牲精神”的工人阶级开始了“直接行动”。

2. 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斗争实践孕育革命文化雏形

中国共产党这个由五四先进分子组成的政党,注定具有浓厚的“革命”色彩。在第一个纲领中就宣示“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在一年之后的二大宣言中,又提出“民主主义革命”。再一年后的中共三大宣言,明确提出党的“中心工作”是“引导工人农民参加国民革命”。当时的中共中央局书记陈独秀认为,“国民运动含有对内的民主革命和对外的民族革命两个意义”。国民革命提出的“打倒列强,除军阀”,也正是五四运动反帝反封建的延续。1925年五卅运动前夕,团中央局总书记张太雷撰文《五四运动的意义和价值》,党内著名理论家瞿秋白撰文《五四纪念与民族革命运动》,将五四运动与当下的国民革命运动有机勾连。1926年3月,李大钊论道:“由五四到五卅弥漫全国的反帝国主义的大运动,是一部彻头彻尾的中国民众反抗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史”^[3]。共产党人意在借用五四论述,以证明反帝民族革命运动的历史合理性。也就是说,五四运动为中国共产党阐述政治革命提供了现代理论资源。

1927年5月,中共五大宣言强调指出:“五四运动是后来有广大社会基础的革命运动之发端”,它使

知识分子的“视线转到劳苦的群众”，“使他们认识无产阶级是当时革命势力后备军”，“近五六年以来从事工农运动的先锋，大都是由五四运动后逐渐训练出来的”^[4]。在这里，五四运动的政治分量越来越被中国共产党看重，而革命的意识形态也从历史中获得认同。在革命形势风云变幻的1927年，与陈独秀、李大钊一同参与建党的张申府明确阐释了革命文化的特征：“革命文化就是适于革命的文化，就是适于推翻旧政权，建设新鲜的文化”。这种文化“应有四种特性”：它“应是动的”，“向前的”，“应是客观的”，“必是民众的”，“还是世界的”^[5]。

由于国民党叛变革命，对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群众公然实施逮捕和屠杀，罹难者达31万之多。这宣告了由国共两党联合发起的大革命彻底失败了，整个中国一片白色恐怖。但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6]。党通过掌握和影响的军事力量以及广大工农群众，在各地接连发起回击国民党反动派的武装暴动。这种触底反弹、绝地求生悲壮意识以前所未有的生命力筑起了革命文化的坚强骨架。

随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工农武装的组建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创立，在敌强我弱的环境下，一种执着理想、艰苦奋斗、敢闯新路的革命文化开始形成。井冈山作为革命的摇篮，正是这种精神和文化的起源地、实验场。面对国民党的“围剿”和封锁，中国共产党人坚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不断壮大力量，扩大苏区，直至创建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苏一大通过的《宪法大纲》昭示天下：建设“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国家”，在苏区的工人、农民、红军兵士及一切劳苦群众和他们的家属，不分男女、种族、宗教，“在苏维埃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中国共产党努力在所影响范围之内实现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理念。井冈山《土地法》、兴国县《土地法》在苏区先后颁行，改变了底层民众的命

运，大大拓展了五四先哲对未来社会的理论设计和逻辑推演。

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创造了世所罕见的奇迹，是一次坚定信念、检验真理、唤醒民众、开创新局的伟大远征，由此而产生的长征精神奠定了革命文化的重要基础。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革命风范的生动反映，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的集中展示，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最高体现”^[7]。有西方学者认为，长征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和心理意义。长征为中国革命选择了最有能力的领导人，强化了高度意志、精神和革命觉悟，以及能够克服物质障碍的信念。“对于那些经受过严峻考验的幸存者和那些为长征精神所鼓舞的人来说，长征的经验使他们恢复了对革命的希望，加强了他们的使命感”^[8]。自此，艰苦卓绝、百折不回的因素加固了革命文化中的钙元素。

3. 革命文化在抗日战争中逐渐成熟，在解放战争中继续发展

在民族危亡之际，中国共产党始终把握时代进步大势，虽然偏居中国版图的西北，却能逐渐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在全民族抗战爆发后的第一个“五四”，毛泽东参加延安各界青年举办的纪念晚会，发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为建立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奋斗”的动员令。1939年是五四运动20周年，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形成第一次五四叙事的高峰。张闻天、刘少奇、陈云等分别题词或撰文。最为著名的是毛泽东的两篇文献《五四运动》和《青年运动的方向》，他在文章里充分肯定青年知识分子的先锋作用、带头作用，阐明青年人在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斗争中，“革命的或不革命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在于“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大众相结合”。翌年初，毛泽东又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专门对五四运动的“杰出的历史意义”进行阐发，揭示出五四运动“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是当时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在思想和干部上准备了一九

二一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9]。《新民主主义论》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前途和纲领进行的深刻阐述,标志着毛泽东思想的成熟,也标志着中国革命文化话语体系比较完整地建构起来,并逐渐走向成熟。

在全民族气壮山河的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作为中流砥柱,为挽救民族危亡,凸显了自身的革命性、先进性和群众性。在枪林弹雨中,体现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民族气节,谱写了爱国主义的伟大篇章,五四反帝精神在救亡的血与火淬炼中得到更为充实的实践,大大丰富和发展了中国革命文化。而且,中共中央在延安13年,以极大的政治智慧和创造力,克服艰难险阻,创立了一个令人向往的新型社会,建构起迥异于国统区的政治、经济和教育制度,并付诸实践,“延安作风打败了西安作风”。这对于日后形成党的领袖处理和平建设时期复杂社会问题的独特方式发生了巨大影响,而隐藏在这些制度和实践背后的价值观念体系也是一份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革命遗产,这就是实事求是、艰苦创业、勤俭节约、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延安精神,是老一辈革命家和老一代共产党人在延安时期留下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抗战胜利后,两条道路、两种命运的抉择又摆在中国人民面前。共产党在对未来道路进行设计时,再次借助五四运动所体现的民主精神。全面内战爆发前一个月,中共领导人朱德、任弼时盛赞五四以来“青年一贯是中国民主运动的急先锋”,号召全国青年团结起来,坚决与全国人口90%的工农群众站在一起,发扬五四传统,反对内战,为实现民主而斗争。在中国命运决战时刻,青年运动(尤以学生运动为显)的作用备受中共领袖的高度重视和认可。1947年5月底,新华社发表评论指出:“学生运动是整个人民运动的一部分。学生运动的高涨,不可避免地要促进整个人民运动的高涨。过去五四运动时期和一二九运动时期的历史经验,已经表明了这一点”^[10]。与国统区民主运动风起云涌相互交辉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军事战场上摧枯拉朽,解放区也

掀起了翻天覆地的社会变革。1947年《中国土地法大纲》规定:“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这一大纲在动员亿万农民积极投身民主革命洪流的过程中起到巨大作用,体现出中国革命积蓄已久的伟大能量,整个解放区革命文化呈现出蓬勃昂扬之势。

二、建设年代五四理念融入现实革命文化与中国道路选择

1949年到来的解放是全国性的,为中国创造新文明提供了广阔的社会空间和难得的历史机遇。也就是说,激烈的军事斗争在未来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生活中不再居于主流,但对国家与社会革故鼎新的全方位建构才刚刚开始。这一年9月底通过的《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体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政体是实行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上指出:“这一伟大事件,彻底改变了近代以后100多年中国积贫积弱、受人欺凌的悲惨命运,中华民族走上了实现伟大复兴的壮阔道路”^[11]。在这场前无古人的社会革命中,秉持成熟革命文化和斗争艺术、抱有远大理想和革命激情的共产党人所做的探索性努力和尝试,无不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1.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革命文化是以往反帝反封建内容的延续

众所周知,新中国是在战胜封建势力总代表和帝国主义势力代理人的前提下建立起来的。而这些旧势力总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以美国为代表的帝国主义武装介入中国近邻战事后居心叵测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自五四运动以来,中国人的“爱国”几乎与“反帝”如影随形,二者相辅相成。“反帝爱国”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强敌压境又一次紧密地组合在一起。应该说,抗美援朝战争是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长期斗争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继续,是新中国同

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之间进行的一场国力悬殊的较量。与在邻国打响抗美援朝战争同时,中国国内迅速掀起一场抗美援朝爱国运动,与之前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一样,中国共产党通过战争动员,把人民群众组织起来同仇敌忾。1951年5月4日,《中国青年》杂志发表社论,赞扬淮南新庄子煤矿“煤矿当战场”“工具当刀枪”的口号,鼓励青年工人把抗美援朝爱国运动和经常工作结合起来。而这场战争的最终胜利,彻底颠覆了旧中国“东亚病夫”软弱可欺的国际形象,有力振奋了民众自豪感和民族精神,提升了新中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威望,也形象生动地充实了革命文化中的反帝内容。

与帝国主义的外来侵略和威胁相比,封建主义对中国社会的困扰是长期的,因此铲除封建因素的任务是持久的。封建土地制度是造成农民贫穷和农业落后的总根源。把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任务和基本纲领之一。新中国成立后实行彻底的土地改革,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土地改革运动,彻底废除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使“耕者有其田”成为现实,长期被压抑束缚的农村生产力获得了全面而深刻的历史性解放,并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发展与整个社会的进步奠定了基础。获得了土地等基本生产资料的农民在人民政府的引领下,真正成为自我管理的农村新主人。在城市,中国共产党开始清理封建社会余毒,经过三年努力,曾在旧中国屡禁不绝、被视为不治之症的卖淫嫖娼、贩毒吸毒、设庄赌博等与新社会、新文明格格不入的丑恶现象基本上被消除。这场扫除旧社会痼疾的民主改革运动,改善了社会风气,净化了社会环境,巩固了人民政权,振奋了精神士气。精英人士和普通民众无一例外地从这一系列民主改革带来的巨大变迁中,深切感受到中国共产党荡涤旧社会污泥浊水的决心、胆识和魄力,进一步坚定了他们紧跟党投身建设新国家、新社会、新生活的伟大斗争。更有意义的是,新的婚姻法保障了妻子与丈夫在家庭中、社会上

的平等,广大女性从家庭的压制中解放出来,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半边天”。这些五四先哲们梦寐以求的社会状态,在中国共产党的创造中变成了现实。

2. 艰苦创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成为革命文化的重要内容

如果说打破旧世界是中国革命的出发点,那么建设一个繁荣富强的新世界就是其落脚点。因此,新中国成立后的经济社会建设,自然就成为革命文化中的又一重要内容。虽然之前在苏区、抗日根据地、解放区也有建设,但新中国成立的建设是全局性的,是改天换地的。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五四青年节,毛泽东给《北大周刊》的题词是:“庆祝‘五四’三十一周年,团结起来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1957年的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周恩来为《中国青年报》题词:纪念五四,新中国的青年们要努力学习,参加劳动,热爱祖国。1962年5月初,参加过辛亥革命的老人、时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的吴玉章撰文指出,知识青年应该发扬五四时期知识青年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优良传统,凡是有条件的都应当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投身到农业战线上去。

改变“一穷二白”的经济面貌,需要的是实干作风和奉献精神。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组织下,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先后创造出北大荒精神、铁人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红旗渠精神等经典样板,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在物质极端贫乏的环境中,以建设社会主义的极大热情,战天斗地,艰苦创业,将常理看似不可能的事情变为现实,彰显了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伟大力量。在这一过程中形成的诸多精神,与革命战争年代的艰苦奋斗、浴血奋战精神一脉相承,从而成为新中国革命文化的主流。另一方面,由于思维惯性和对以往成功经验的依赖,执政党常常通过群众运动来组织大规模经济建设,从合作化运动,到“大跃进”运动,再到人民公社化运动。表面上轰轰烈烈很有气势,但由于过分强调精神的力量和组织结构的优化功能,实际效果大打折扣。正如邓小平后来所总结的:“我们是搞革命的,

搞革命的人最容易犯急性病。我们的用心是好的，想早一点进入共产主义。这往往使我们不能冷静地分析主客观方面的情况，从而违反客观世界发展的规律”^[12]。

经济建设和社会改造都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需要遵循事物发展规律，对人的思想改造更是一种革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号召下，全国上下尤其是在广大青少年群体中先后开展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教育活动(1953-1954年)、共产主义道德教育活动(1954-1955年)、学习毛泽东著作活动(始于1958年)、学习雷锋活动(始于1963年)，以及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各种实践活动，其目的都在于碾压小农意识，重塑人的精神道德，使公而忘私、助人为乐等集体主义价值理念和革故鼎新、移风易俗等革命文化基因注入到新一代民众的记忆中。

3. 五四精神与革命文化融合中的偏离与反思

历史常有吊诡之处，新中国经过十七年的全面发展，行进到一个复杂而敏感的国际国内环境中，创造新社会、新文明的革命文化越来越被狭义地理解为斗争文化，逐渐偏离了正确轨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作为非理性的不断革命理论，成为“文化大革命”发起的理论依据。红卫兵作为“文革”的急先锋，其“革命造反”运动是从“破四旧”开始的。诚如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所指出的那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要彻底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创造和形成崭新的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这是人类历史上空前未有的移风易俗的伟大事业”^[13]。一部分红卫兵在“破四旧”的名义下，捣毁、涂抹文物古迹，焚烧中外古典名著、珍贵文物字画，连山东曲阜的孔庙和孔林也未能幸免。他们到处发布通令，把许多传统的有影响的路名、商店名、医院名等斥为“封、资、修”而改换成有着浓厚政治色彩的新名称。

《人民日报》在1969年5月4日发表社论指出：五四运动“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发展到了一

个新的阶段。它在中国历史上，划出了一个完全新的时代”。“知识分子一定要下定决心，长期地、老老实实在地拜工农兵为师，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坚定地在这条正确道路上走下去。”如何接受“再教育”？“只有毛主席指出的方向，才是青年运动唯一正确的方向。”原则和精神表面上看没有什么变化，但环境和方法已经今非昔比了。社论进而论道：“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在他的黑《修养》中，大肆宣传孔孟之道，毒害广大党员和青年，为孔家店招魂，充分表现了他妄图复辟资本主义专政和维护一切反对阶级利益的反革命面目。”1974年5月4日《人民日报》社论又指出：“反孔与尊孔的斗争，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阶级内容和政治内容，但都是当时阶级斗争、党派斗争的一种形式，是政治思想领域两条路线的斗争。尊孔复古，总是代表着倒退和复辟的没落阶级的利益。”至此，貌似与五四运动一样反封建的“批孔运动”，实际上已经同五四精神南辕北辙了。

三、改革开放时期五四精神有机嵌入革命文化和现代化建设

1978年年底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当代中国最有影响的政治事件之一，揭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幕，尘封已久的社会活力开始得到释放，狂热而又迷惘的青年开始回归理性。随后，青年与社会在政治松绑中一起成长，五四精神踩着改革开放的锣鼓点，再度引发热议和广泛认知。改革开放正是在解放思想前提下，成为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的讲话中精辟论道：“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我们党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正是这个伟大革命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飞跃”^[14]。

1. 改革初期开创新局与五四精神回归

尽管十年浩劫之后求富求强已成为人们的基本

共识,但开辟现代化新路却需要逆势而上。从真理标准大讨论到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都为改革开放创造了条件,铺平了道路。在这一过程中,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恢复理性思考、开始意识到自我的存在。1979年是五四运动爆发60周年,《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解放思想,走自己的道路》,文章开宗明义:“正当我们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四个现代化上来,提倡解放思想,发扬民主精神和科学精神的时候,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具有特殊的意义。”5月4日,一场五四亲历者座谈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邓颖超、许德珩等回忆历史场景,重新审视“五四”解读,试图恢复与思想解放运动相契合的五四历史面目。

1978年开始的改革,不是在原有基础上的修修补补,而是对体制的根本性变革。这种变革需要战胜很多保守思想和势力的挑战才能实现。因此邓小平在1985年指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这是一件很重要的必须做的事,尽管是有风险的事^[15]。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时又强调指出:“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16]。邓小平理论中的这种自我革命精神,是对社会主义曲折历史理性反思的结果,是对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历史性超越,开辟了中国革命文化的新航道。

在改革风云初起、反思成为时潮的进程中,关于是否“告别革命”的论争作为一段插曲,反映了学者们的不同视角和观点。其实,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革命概念,几乎包含人类社会一切领域所发生的革命,比如宗教革命、哲学革命、政治革命、科技革命、经济革命等,并不单指以暴力斗争推翻既存政权。事实上,中国革命一路走来,完全基于独特的国情民情和历史环境,革命作为手段和目的的统一体,其中就包含着广义和狭义的有机融通。或许,当革命作

为特定历史境遇中的必然,难免彰显出一定的破坏力,但战胜自然、改造社会的变革无论如何是不能告别的,否则就无异于自绝于人类进步,因为科技、经济、文化、社会、政治诸领域的革命,共同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程。

2. 重新强调五四精神在市场经济改革中的价值和意义

1992年之后,中国共产党在经济改革中坚定不移地引入市场经济机制。正是由于市场经济的自主性质,促进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所必需的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的自主意识(当家作主意识)的发育、成长和逐渐成熟^[17]。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并不是简单的经济体制转型,其实质在于经济运行模式由命令支配转向自主选择,个体行为由盲目服从转向自我苏醒,主观认知由简单臆断转向科学理性,由此,国家经济现代化进程的内在逻辑推动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进程。进而言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构的过程,也是自由、民主、平等、法制等观念深入人心的过程,也是社会成员与国家的关系、与社会的关系重构的过程。可以预见,人的独立人格、个体的价值、小众的诉求、个性化表达将越来越得到包容和肯定。这一过程正是五四理念在不同社会环境中的本质追求。

1998年5月4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为庆祝北京大学建校100周年题词:“发扬北京大学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优良传统,为振兴中华做出更大贡献。”1999年5月4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胡锦涛在纪念五四运动80周年大会上明确指出,五四运动“孕育了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伟大精神”,并强调“五四精神的核心,是伟大的爱国主义”。“八十年的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是五四精神最忠诚的继承者”,党“总是根据不同历史时期的形势和任务,把五四精神同人民群众推动社会进步的实践结合起来”^[18]。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五四精神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功能转换,越来越注重挖掘五四精神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推动作用。五四运动作为

一种历史的纪念,其重要意义在于把五四精神注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使之发扬光大。

3. 进入新世纪科学发展拓宽了革命文化的边界

中国是伴随着市场化、全球化、网络化、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的持续融合而进入21世纪的。经过20多年的大改革大开放,中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中华民族大踏步赶上时代前进潮流、迎来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中国的经济、文化、政治对世界影响越来越大,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发生了历史性变化。

在中国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依然存在着能源紧缺、资源浪费、环境污染、区域发展不平衡、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等突出问题,群众在就业、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领域还面临不少难题,其重要根源在于把经济增长等同于社会进步的传统观念和粗放式发展模式。打破偏重于物的增长忽视人文、资源、环境等指标的观念和模式,实际上是需要调整利益格局的,这又是一场革命性变革。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提出科学发展观,其最大创新和亮点就是它的人本性。本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一直都是党的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但在局部与整体、效率与公平、经济与社会、黑色GDP与绿色GDP等多重矛盾纠结中,这一基本点曾有所缺失,科学发展观就是要回归以人为本的政治原点。

2009年是五四运动90周年,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李长春代表中共中央在纪念大会上指出,五四时期的先进青年知识分子高举民主和科学的旗帜,积极探索指导中国人民根本改变受奴役、受压迫地位的科学真理和发展道路。他们以高尚的爱国情操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诠释了五四精神的丰富内涵。讲话着重阐发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了五四先驱们不懈追求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奋斗目标,找到了

五四先驱们矢志探索的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的正确道路。这里实际上再次强调了五四精神与民族复兴的有机衔接。

居安思危是中国共产党保持先进性的动力之源。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明确指出:“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四大考验”“四大危险”从此成为一个时期以来中国共产党人的长鸣警钟,激励鞭策全党上下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进一步坚持和充实了革命文化中的前置性内容。

四、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以伟大的自我革命推动伟大的社会革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始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历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实现民族复兴的光明前景。要完成和实现这一夙愿和梦想,改变的将是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华文明演进的轨迹和由来已久的思维定式,不但不可能轻轻松松,而且必然要进行伟大斗争。越是接近伟大目标,越需要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省调研指导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时再访革命圣地西柏坡,重提“赶考”：“当年党中央离开西柏坡时,毛泽东同志说是‘进京赶考’。60多年过去了,我们取得了巨大进步,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富起来了,但我们面临的挑战和问题依然严峻复杂,应该说,党面临的‘赶考’远未结束”^[19]。新时代再度呼唤伟大五四精神的回归,呼唤革命传统价值的扬升,为建构中国现代文明秩序激发创新胆识,汇聚理性力量。

1. 提出“两个伟大革命”的重要命题意义深远
作为治理一个超大规模国家的政党,新时代要

有新气象,更要有新作为。面对百年未有之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期,历史的天平只会倾向于步伐坚定的奋进者和搏击者,绝对不会同情和等待犹豫者、懈怠者、畏难者。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能够带领人民进行伟大的社会革命,也能够进行伟大的自我革命”^[20]。“必须以党的自我革命来推动党领导人民进行的伟大社会革命”^[21]。由此,“伟大的社会革命”和“伟大的自我革命”被称为“两个伟大革命”,并成为全党上下的重要共识。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革命之所以伟大,不仅在于扫清了阻碍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的“三座大山”,创立了一个崭新的国家和社会,建构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制度,还在于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朝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预设目标奋勇前进。事实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近代仁人志士孜孜追求的奋斗目标,其本身就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只有通过一场又一场触及底层的社会变革才能逐步实现。那么,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能够完成近代以来各种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成功推进社会革命呢?这恰恰在于它高度重视自身建设,没有混同于一般利益集团而保持先进性,明显区别于政客团伙而保持纯洁性,始终把人民群众视为生命力的最主要来源,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不断推进自我革命。应该说,自我革命意味着对自身的省察与反思,这是中国共产党最鲜明的品格,也是最大的优势。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敢于刀刃向内动真格的,毫不讳疾忌医,向党内顽瘴痼疾开刀;坚持一抓到底钉钉子,毫不含糊,把管党治党要求落实落细,贯穿着强烈的自我革命精神,体现了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决心和意志。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对红色革命文化的传承和弘扬,强调“没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底蕴和滋养,信仰信念就难以深沉而执着”^[22]。在对“红船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抗战精神”“三山一坡精神”等红色革命精神的

论述中,赋予了其鲜明的时代特色和精神内涵,形成了以牢固的理想信念、坚强的党性原则、高度的文化自信和勇于革新、实事求是、无私奉献精神为主要精神内涵的红色革命文化思想。

2. 在“五四”百年纪念中赋予新的时代价值

五四运动的内在原发点是爱国情怀,其最核心的价值传承是爱国精神。五四传统始终与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相缠绕,沉淀在一代代中国青年的血液中。2019年是五四运动100周年,4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十四次集体学习时对五四运动和五四精神研究,明确提出了“四个讲清楚”“两个统一起来”,尤其是要“回答好为什么当代中国青年运动的主题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为什么当代青年必须把个人理想融入民族复兴伟大理想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4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指出,五四运动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五四精神是五四运动创造的宝贵精神财富。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发扬五四精神,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积极拥抱新时代,奋进新时代。讲话以评价五四开篇,以激励青年落笔,期许青年英雄成为驱动中华民族加速迈向伟大复兴的蓬勃力量。

中国共产党对“五四”的纪念伴随着革命文化建构的全过程。党自成立之日起,就以五四精神为思想资源的直接源头,创制并不断完善革命话语体系,以适配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使命。新中国成立后,党推动社会主义建设和思想改造,需要广大青年积极参与并成为革故鼎新的主力军,因而开启了五四精神现实性转化的探索路径。改革开放重启中国现代化之路,中国共产党在实事求是的话语氛围之下,重新解释五四价值,打通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区隔。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纪念五四运动,力求回归本源,唤起初心,超越世俗,走向理性,从而更加有效地激励广大青年铸造“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人格,勇做走在时代

前列的奋进者、开拓者、奉献者。

3. 五四精神在新时代青年中的认同与传播

不论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变迁,还是从国内深刻变革中的发展态势来观察,当代中国都面临着百年未有的大变局。大变局需要大格局,大问题的解决呼吁思想的大视野。而思想解放一直以来就是改革开放和社会进步的内在动力,新时代如何才能实现思想的真正解放,不断推进现代人格的建构呢?需要重新认知五四精神与现实中国的相关性。连续10年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的中国,已经成功地走出了一条具有自己特色的经济现代化、科技现代化之路,政治现代化、制度现代化、社会现代化正在密切跟进,次第展开。以“爱国、民主、科学、进步”为重要内容的五四精神作为一种基因,在100年的风雨兼程中已经植入到了中国人的思想细胞中。五四精神作为一种青年精神、现代精神、未来精神,成为不同历史背景下中国青年艰苦奋斗、砥砺前行的重要精神支撑。这种精神在新的历史环境中应该有与时俱进的阐释,围绕创造新文明、推动民族复兴这一恒定主题,进一步因时因地而创造性发扬光大。我们告别的是五四运动时期那个积贫积弱的时代,以及五四运动某些呈现于世的外在形式,绝对不可能告别伟大的五四精神。

新时代青年对五四精神乃至革命文化的认知,的确存在认同客体的抽象性、认同主体的层次性、认同机制的复杂性等突出问题,而且社会分层与利益分化影响认知取向,信息化与新媒体技术造成鱼龙混杂,价值多元与文化思潮带来观念冲击。“当革命精神也被当作稀缺价值加以商业开发时,世俗社会对神圣性的消解也就达到了顶峰”^[23]。要破解这些认同传播中的结构性限制任重道远,需要科学理性的顶层设计,宣传部门、教育部门等行为主体的通力合作,共青团组织的积极介入,以及五四精神传播机制的整合。同时,还要加强对外宣传,在国际舞台

上讲中国五四故事,将五四精神融入世界文明大潮之中。

参考文献:

- [1][21]习近平.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要一以贯之[J].求是,2019(19).
- [2]陈独秀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8-9.
- [3]李大钊全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124.
- [4]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216.
- [5]张申府文集:第1卷[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98.
- [6]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36.
- [7]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47.
- [8][美]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M].杜蒲,李玉玲,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46.
- [9]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99-700.
- [10]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225.
- [11]习近平.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9-10-02.
- [12][15][16]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39-140,113,372.
- [13]横扫一切牛鬼蛇神[N].人民日报,1966-06-01.
- [14]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8-12-19.
- [17]张志明.从民主新路到依法治国[M].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0:329.
- [18]胡锦涛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361-363.
- [19]李斌.党面临的“赶考”远未结束——习近平总书记再访西柏坡侧记[N].人民日报,2013-07-14.
- [20]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87.
- [2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17-18.
- [23]许纪霖.当代中国的启蒙与反启蒙[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53.